

乐昌文史

8

乐昌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编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

19.54

91

目 录

- 一、忆在梅花杨家寨闹革命……………谷子元（ 1 ）
- 二、革命烈士李家泉……………廖治金（ 14 ）
- （ 14 ）
- 三、乐昌县取缔反动会道门简况……………邓德俊（ 20 ）
- 四、瑶埠史话与瑶山风情……………韦 文（ 25 ）
- （ 25 ）
- 五、赵佗城拾遗……………沈 扬（ 40 ）
- （ 40 ）
- 六、辛亥革命后乐昌县长（知事）任职情况
补充……………周敬泽（ 43 ）
- （ 43 ）
- 七、名伶何万杰……………罗其森（ 44 ）
- （ 44 ）
- 八、建设初期的第三经济林场（续完）…
……………侯铭昌稿 邓贯然整理（ 47 ）
- （ 47 ）
- 九、深塘梯矿沧桑……………
……………叶祝貌口述 杨民生整理（ 55 ）
- （ 55 ）

EA26/08

- 十、初创时期的连胜中学.....严水生 (60)
- 十一、忆乐昌女子小学.....郭尚媛 (64)

- 十二、光复后乐昌第一个夏令卫生清洁运动
.....陈 登 (71)
- 十三、西京古道采风记.....韩春华 刘国雄 (77)
- 十四、云祖三绝.....风 月 (93)
- 十五、也谈梅花闹子.....江翠华 (100)

- 十六、乐昌各界庆祝抗日胜利记.....何 桃 (102)
- 十七、抗战后的乐昌第一市场.....刘 也 (104)
- 十八、短命的乐昌商民义勇警察中队.....何亚球 (106)

- 十九、《梅花圩史话》地名质疑.....江翠华 (110)

忆在梅花杨家寨闹革命

谷 子 元

一九二八年初，我们家乡（湖南省耒阳县十八区三圣祠村）正热火朝天地大闹革命之时，突然风云骤变，国民党反动派派出军队与地方上的“铲共队”、“挨户团”向我们进行“围剿”，全区组织起的十三个革命村政府，除我村外全部被摧垮。敌人集中力量对我村进行残酷的扫荡，情况非常危急，为了保存力量，村政府决定向广东梅花转移。农历三月十一日拂晓，我和谷振华等几个革命知识青年，经过化装，跟随村里的泥木工师傅一行共十五人，怀着“风潇潇兮易水寒”似的心情，离开了家乡，沿途偷关越隘，钻过近三百华里的敌人防地，本来只需四天的路程，却走了七天才到达目的地。记得过了湖南省界，踏上广东地境后，首宿坪石，渡武水，过管埠，来到属于梅花的地方，同志们才深深地嘘了一口气，有的还唱起了山歌来。这使我深深感到：闹革命没有真枪实弹不行；知识分子、年青学生不相信、不依靠工农劳苦大众也不行。

我们进入梅花以后，原来在此做过泥木工的同志沿途分别投向各自的老雇主、老朋友，我、谷振华、周兆奎、周达、张振纲叔侄等分别跟随他们到各落脚点去。老雇主、老朋友见面后都亲切地问：“为什么这个时候才来呀？在家搞什么去了？”表示出热情和关心，我们听后就都放心了。安定下

来后，到三和坳那天，同来的人都去赶场（趁圩），中共党员开了会，决定成立中共梅花支部（即泥木工人支部），发展党员、团员，联系当地群众，关心帮助不断从湘南潜来隐蔽的同志，解决做工吃饭问题，提高警惕、严防敌人跟踪追捕。同时成立鲁班工会，组织地方群众，改善工人生活。为了便于工作，还决定以三和圩为联络点，对内逢圩集会，交换情况，对外与坪石街（今老坪石）的党组织保持联系。联络点下分四片：一是梅花洞；二是大富岗、出水岩、辽水；三是樟木洞、坛司、大坪杨家；四是清洞、铜锣坵、平溪等地。

是年十月，中共两广省委军事负责人钟振华（黄埔军校学生，参加了南昌起义，湖南耒阳县人）来到坪石，我接到通知，由梅花去见他。在坪石，我与尹子韶（原湖南永兴县红色警卫团团团长，当时潜到宜章、临武交界的龙水地方）、黄平等成立了湘南人民军事委员会，主要向驻在宜章城和郴县良田的范石生部搞“兵变”。准备夺得枪枝后就打回老家去。后因情况变化，指挥不统一，结果，枪都拖出来了，却被敌人发觉追击溃散，以致牺牲了不少人。接着，我们成立了以宜章、临武、连县为立足点的中共湘粤边工作委员会。时值蒋、桂军阀混战，桂系军阀溃归老巢广西，他们途经广东时，为乐昌县的地方反动势力收买利用，把数百户的大坪杨家村子烧成了废圩，我的伯父谷长必（泥木工人）也被敌人搜山打死在杨家寨后山上。敌人还在梅花洞“清乡”，湖南方面的反共分子也想与粤方联合一致对付我们。深居简出隐蔽在石带的余经邦（宜章县赤石农军领导人）闻讯已转移别处，我和谷振华、周兆奎及张正纲叔侄等，亦随大批泥木工人转到大坪杨家寨做工，梅花党支部和部分党员也转到杨家

寨来，杨家寨便成了我们的新据点。

横遭浩劫，受尽苦难的杨家寨人，这时正待重建家园，见到这么多湖南人来帮助，悲喜交集，对这些泥木工人分外亲切，我们便因势利导向他们倾诉国民党军阀压迫人民、杀害革命人士的种种罪恶，他们听了振奋起来说：我们广东“十三行”，越烧越排场，其奈我何！那时在工人间我们互相敬爱，我对造屋砌墙虽还是个新手，但一些老泥木师傅对我似乎特别的尊重，生活也予以照顾，这情况为寨中德高望重的杨梅老先生父子察觉，故初时他便说：“这介佬不是师相古（即不是做工的）。”后来他明白，这介佬是搞革命的，与朱德他们是一起的。因一九二八年元月，朱德、陈毅等同志率领工农革命军由广东进湖南时，途中曾在杨家寨驻扎，策划攻取宜章城，当时杨梅与村中士绅，由同族的杨子达（宜章农民领袖）陪同欢迎慰问过朱、陈的部队，对革命的正义之师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产生了一定的进步思想，故见到我们便谈到朱德。也因国民党对杨家寨接待了朱、陈部队，便以“通匪”为借口，进行大肆烧杀，播下了仇恨的种子，这种情况对我们在上层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极为有利。后来，我与杨梅的孙子杨耀奴建立了“打同年”“结庚友”的兄弟关系。这样一来，全村男女老少，除个别外出读过中学的人对我们有点怀疑外，都把我们当作远亲近邻老熟人看待。

寨子内的少数青壮年去武水拦河打劫，一般说来，这是不好的，但我们分析，那是由于生活所迫才去铤而走险的。大坪杨家遍地石头，没有几坵好的水田，村民只得在石头缝里种点杂粮（包谷）、蔬菜。靠湖洞那边虽有大片的山林，但是地主的。农民生活非常困苦，痛恨旧社会的制度，革命

斗争很勇敢，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我们认为，对那些铤而走险的人不应歧视，应加强教育，引导他们走上正道，拿起武器同我们一道去斗争。经过调查，我们首先发展了他们的头头杨炎安入党。他枪法最准，部下最信服，并以他为骨干，在杨家寨成立了第一个党支部。当时传闻湖南的反动派要来捕捉我们，杨炎安便问：“几时来，带枪来么？”我说：“一定有枪喂！”他连说：“好得很，好得很！”意思是要缴他们的枪，我们见他态度如此坚定，非常高兴，因为有了他们合作，便有了武装保障，他们是早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较量过的。某年，乳源县县长王攀桂带着一班人枪来杨家寨催粮收税，就被他们杀了，枪也被缴了。我们党内有的同志戏谑地说：“他们还是打土豪、杀贪官污吏的老手啊！”还有说：“这是杨家寨子的特产咧！”梅花地方哪个不怕他们？

一九二九年春，我们湘南地区党的工作，武装活动有些进展，主要是各县失散的同志基本联系上了，与中共两广省委也同时联系上了。坪石街的党组织很活跃，以尹子韶为首，我们第二次在坪石开会，决定成立中共湘南（驻粤）工作委员会（即湘南工委），尹子韶为书记，我任宣传部长。会后，懂得中医的尹子韶来杨家寨巡视工作，见支部书记杨炎安家贫如洗，害病无药治，行动艰难，便采用“三两三”中医单方为他医治，药到病除，杨炎安非常感激，更加深了同志的感情，亲密如同手足，杨家寨的人也互相传颂尹子韶的医术高明。

就在这个时候，杨高林从湖洞附近的石子崙来看杨炎安，我便和杨高林接上了头，由杨高林介绍，我才知道马头岭的杨炳英早与他有联系，后来又知道杨炳英还是共产党

员。我们通过杨炳英获悉猴公坑、泗公坑木炭窑的湖南人，都是宜章农军二十九团第三营李光中部失散的指战员。这个部队，即是一九二八年八月，朱德指挥攻打郴州城的红军大队第三营，他们是从黄圃司、九牛岭、歧门来到这里落脚的。那里的党支部书记刘耀文，宜章分水坳人，原姓肖，懂草药，他们掌握有几支枪，有时潜回湖南搞暴动、肃反，解决经济上的困难。

五月，杨高林叫我去他的住地石子崖开会，参加的人有原三营党代表李光中、营长李光化（嘉禾人）、政工人员李文修（宜章新平山人）、杨高林与我。会议决定成立中共乐（昌）乳（源）宜（章）边工作委员会，李光中为书记，我是委员之一。活动地区较前宽广多了，分别以黄圃司为中心，到塘村、九峰、九牛岭、歧门，以罗家渡为中心，上溯坪石、龙阳、七姑滩、新老坪山，下沿武水到管埠、老爷庙、加昌水、马头岭。从此，一面去溯洞之上坪和打禾塘，一面上大坪杨家寨势力范围内的各村和寮庄。有武装与联系着各方的杨家寨，成了重要的、可靠的革命指挥阵地。

一九三〇年十月，在湘南（驻粤）工委和临（武）宜（章）连（县）边工委的基础上，成立中共湘粤边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边委）。各地党、团主要负责人共三十余人，齐集到杨家寨村的敏求堂（公屋，为泥木工人住处），参加边委第一次扩大会议。会期五天，圆满地完成任务后，放鞭炮、碰杯、猜拳，胜利地结束会议。边委书记仍由尹子韶担任，我与黄平职务仍旧，增加了彭良、曹彬为委员。会后，杨梅满脸笑容地对我说：“你们这么多人，好多是读过书的哩，多住几天！”杨梅是前清的“廪生”、贡生，喜欢博学多才、舍己为人、有志气的年青人。他家的人也对我们很尊

重、热情，庚友杨耀奴奉命邀我到他家吃过饭，杨耀奴的爱人是官村人，敢冲破当地森严的“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桎梏，见到我就叫一声“庚兄”，也许逞“庚兄”的威风，认为男女平等的日子到了，故也就不忌别人说闲话了。过了两天，边委机关迁到大坪杨家寨势力范围的泗公坑木炭窑林中（现大瑶山一带）办公，我仍住在杨家寨敏求堂泥木工谷安淳兄弟的厂子里。

一九三一年一月末，在辽水、逐口地方干活的泥木工人跑来向我报告：“由星子、连州过风头岭向岩泉、栗源堡来了一支军队，行得很快，沿途遇有电话杆就砍倒，军帽不像国民党的，穿着单军服，没有背包，子弹带里的子弹没几颗……”我判断，要沿途砍电话杆的部队肯定不是国民党的，应是反对国民党的，但工农红军在江西，而这支队伍却由南向北，方向不对呵！于是，我一面派人报告边委，一面动身赴梅花了解究竟。我到达梅花街时，部队已经到了，贴出的布告署明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军长张云逸，党代表邓斌（后来知道即邓小平同志），政治部主任陈豪人，总指挥李明瑞。经哨兵引导，我见到了邓党代表，他问：“你们是哪里人……哦，湖南的，有多少人……好！帮助发动群众，在这里打仗。”我们遵照他的指示，立即通知各党支部发动群众，全力以赴，支援红军作战。当时，遂从连州便紧咬我红七军不放之粤军陈济棠部邓辉旅、从湘南赶来的唐伯寅师和郴县、宜章等县部分地主武装合共万余敌人，从坪石至歧门沿河岸对红七军进行包围，有部分敌人则分头擅渡武水，直奔梅花洞，来得快的已到达西山桥。第三天早晨，战斗在梅花洞打响，枪炮声震撼山谷，敌人反复冲锋，都被我英勇的红七军击退，从阵地接火到白刃肉搏，激战了一整天，

敌人伤亡惨重，我方亦付出很大的代价，师长李谦重伤，师长龚鹤村（即龚楚）腿部中弹。夜幕降临，红七军全部以及红八军干部大队人员均转移到大坪杨家寨，决定甩掉这部分敌人，第二天抢渡武水，进入赣南中央苏区。

红七军转移到杨家寨时，尹子韶、杨炎安带领群众（包括村的上层人士杨梅、钦冠老古等）热烈欢迎，并做好了战后的一切工作，筹措了队伍进中央苏区的途中所需的粮食，还派出了向导。当时由杨高林连夜带队出发，负责往大桥那边安置伤病员，我们将受伤的师长和干部大队离队赴两广省委的同志，分别向石子坝、泗公坑转移。

红七军离开杨家寨后，到达乐昌长来渡河时，为国民党调来的军队阻击，队伍虽一部分过了河向仁化前进，但张云逸率领的那部分却未能在长来渡过武水，只得折返潮洞，沿大山中那条溪水改道到加昌水口，渡武水向黄圃司前进。其时，恰逢边委机关人员外出，在途中见到张军长，才知情况。边委立即派我追赶到黄圃司，在宿营地再次见到张军长，我便从原湘南郴县农军中，找到两位曾往返过井冈山、安全直达湘赣边苏区的党员给他作向导，保证了部队顺利奔赴井冈山，安全直达湘赣边苏区。

在这前不久，中共乐（昌）乳（源）宜（章）边委书记李光中牺牲，罗家渡、新老平山等地党组织遭到破坏，粤敌又大肆叫嚣要以大坪杨家为主要目标进行清乡，加上这次红七军过境，反动派狂吠得更厉害。因此，边委机关迁至黄圃司，有色彩不能再在此立足的同志暂时疏散，我也因之离开杨家寨，离开了患难相依、生死与共的同志、朋友和杨家寨拥护革命的广大人民。然而，梅花、大坪、泗公坑、马头岭等地的党员和湖南来的泥木工人，都原地未动，仍扎根在群

众中积极地继续开展工作。

我们进入梅花和在大坪杨家立足这段时间，记得还有几件事：一是中共两广省委曾两次派员前来巡视，指导工作。第一次来的是柯飘零特派员，他是由东江苏区调到两广省委的，高个子，单瘦的身材，满口广州话。那时苏区战斗频繁，残酷，干部生活艰苦，柯飘零年纪不到三十岁，但皮肤已黄褐起皱，遍体生疮，抓得不停。第二次来的姓伍（名字已记不起），是特派员身份，也讲广州话。他们来如轻风，去似浮云，都住三四天就走了，相互见面，都在杨高林家——石子崙，而柯飘零则来过杨家寨子。二是红七军过境后，边委乘敌主力追击我军，无暇布置清乡、设卡之机，便争分夺秒，夜以继日地把离队干部护送到香港油麻地联络站（一间湖南人开设的理发店）。三是想尽办法把龚鹤村师长的腿伤医好，以便他早日脱离恶劣环境。四是两广省委派李弼廷随红七军进中央苏区没有赶上，省委指示李弼廷以巡视员身份留在湘南工作，继李弼廷之后，两广省委又派王涛（特派员）来直接领导湘南的工作。五是边委派我去坪石新街拱桥边公盛成客栈（伙铺），迎接并陪同王涛进黄圃司，下榻张泰兴店内。王涛是江华人，一九二五年去苏联留学，张泰兴老板有个儿子也于一九二五年去苏联留学，与王涛同班。张老板见到这个眉清目秀、通情达理、平易近人的“出洋”生，联想到自己的儿子离家后多年没有消息，剩下媳妇白玉孤守寒灯独影，便向王涛打听消息。王涛一句话——“儿还在”。解下了全家的思想包袱，他家对王涛非常的感激和信任。

一九三一年三月，在边委基础上成立中共湘南特委。其组成人员和分工，仍是边委原班人马，我仍是宣传部长。红七军过大坪时，留给边委一百五六十支步枪和两挺重机枪，全

区军民非常感谢与高兴。特委决定，在原有武工队、征伐队基础上成立湘南红军大队，农历四月，向湘南出发，直捣瑶岭、骑田，配合中央苏区、湘赣苏区反“围剿”，取得很大胜利。从此湘粤军阀开始进入联合“剿共”的阶段。七月，红军大队遭到严重挫折，牺牲很大，黄圃司地方革命组织破坏严重。八月，湘南特委改组，王涛当书记，我仍是委员。在王涛领导工作期间（一九三一至一九三四年冬），湘南、湘粤边境地区正式形成赤色游击区，队伍不断扩大，政治、军事素质加强，配合苏区红军反“围剿”，夜袭郴州城，建立郴县第二区革命委员会，实行焚契分田地，这时，大坪、梅花等地的党组织，由湘南特委宜（章）乐（昌）县委领导。我们发展党、团员，参军扩军，为游击队购买枪支，并护送到目的地。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中央苏区红军长征过境，泥木工人参军者二十多名，这些人中后来有的牺牲于湘南，如周满乃、谷安调等，到主力部队去的，解放后我只见到周丁开（泥木工），从新四军营长级转业回到老家来阳。

中央苏区红军过境后，敌人跟踪扫荡，郴县原县委书记陈文光叛变，砍死特委书记、郴宜临时办事处主任彭林昌，接着宜、乐县工委书记杨绍吉变，敌人的围剿日益猖獗。这时，湘南特委和党团机关早已迁来（阳）安（仁），留在郴县的彭林昌牺牲后，郴宜临时办事处无人主持。由湘南特委直接组织领导的湘南红军支队和郴县、宜乐两个县大队共有八百多人枪。我当时任湘南红军支队政治工作团主任。经过在郴县、桂阳、临武、宜章等地五个多月的生死搏斗，两个县大队的大队长张东、肖福生均先后牺牲，七百多人枪的队伍只剩下十三支枪，后来由原工农红军湘南赤色游击队副大队长肖良略（即肖仰岳），收集、率领潜入泗公坑、马头

岭。我湘南红军支队有百五六十人枪，支队长颜赤爱负伤被俘，三中队长老肖牺牲，仅剩下我和支队政委余稼生等六个人五支枪。经过昼伏夜行，声东击西，巧妙地冲破敌人和叛徒们设下的“天罗地网”，于一九三五年二月的一天（记得是民国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拂晓，踏上乐昌地境之皈塘乡寨头岭村驻下，由于政治环境变化，不能久住，即转移到大坪杨家地区的泗公坑、马头岭与肖良略等会合。当地党员和群众与我们重逢时异口同声地说：“你们辛苦了，回来了就好呵！”把我们当作家里人外出做事回来的看待，亲切异常。

从一九三五年起，“敌后三年游击战争”打响，我们的人分散在四面八方，上下组织联系不起来。我们将能齐集的人齐集到马头岭杨炳英家开会，对新的情况及我们的活动方法进行研究。一致认为：第一步是先隐蔽在杨家寨势力范围内的加昌水口、泗公坑木炭窑一带，扎稳脚跟，第二步是向两省三县水路交连之乐、乳、宜地带扩展。方针、步骤既定，大家推举我为书记，恢复重建中共湘粤边工作委员会和中国工农红军湘粤边赤色游击大队（以下简称游击大队）。游击大队由肖良略任大队长，林长春任政治委员。边委组织委员贺畔朵，用做长工、打零工的名义到梅花大坪杨家进行活动；宣传委员余稼生去宜章岩泉东河姚家，做地方自发武装姚炎保部的统战工作。

一九三六年元旦前夕，肖良略、林长春率领游击大队到歧门对河陈家打土豪，肖良略被土豪婆舞手舞脚，使手枪走火，中弹牺牲。敌人发觉后，又叫嚣“清乡”。我军士气受到影响。林长春强制蒋玉林（副大队长）赶来阳、安仁找特委。余稼生去宜章姚家后没有信息。正在这时，李林在坪石

附近的新水坝石灰砖瓦窑老板、中共党员曹金芳、李顺乃的联络站找到了我们。李林原是湖南赤色游击队第一大队大队长，杀敌制胜有方，边委决定由李林继任游击大队长。在这艰苦时刻，他的到职，同志们很受鼓舞。队伍随即扩大，增加新游击队员十多名，并缴到光洋一万三千多块，买得一色新的短枪十余支，其中二十响的快慢机两支，手提机枪（又称花机枪）一支。有了枪，又有了钱，大家雄纠纠、气昂昂地北上到郴、宜游击区去肃反。首先，拿到万民痛恨、谋杀自己亲舅父郴县县委书记黄体国的谢振尧的首级，挂在良田附近马路边电线杆上示众。接着，又在宜章城附近消灭了伪装倾向革命、谋害我宜乐游击队队长和战士共十余人的伪保长胡××。这样，我游击队声威大振。叛徒陈文光，黄传郎等首要分子胆寒动摇，引起地主恶霸等反共顽固分子对他们怀疑和警惕，不久，就将他们全部暗杀了，革命群众无不拍手称快。我游击队回师乐昌、乳源，又袭击了驻田头的一个乐昌警察中队，缴获全部枪支，还在深夜冲上九牛岭，镇压了谋害我宜乐县委组织部部长张老大的反革命甲长一名。湘粤敌人深感不安，继续采取剿、抚、清的反动政策，进一步在“清”字上下功夫，千方百计清查我党地方组织及活动情况。他们一面从游击队内部拉出去一个叫谭金英的女队员（谭在郴县良田投敌叛变），一面利用叛徒曾经任过湘赣红四团团团长李宗保，尚未被基层党员和广大群众识破之机，由湖南清乡司令部与广东西北绥靖公署调集反动武装（含李宗保叛部），突然合围扫荡我乐（昌）乳（源）宜（章）三县结合地带。由于叛徒谭金英曾随游击队住过大坪杨家地区之湖洞、上坪赖家，加昌水口、马头岭、平溪、铜锣坵等地，知道大坪杨家、梅花洞之湘籍泥木工人的革命者，因之，首先进攻我饭塘乡坳

村党支部，逮捕了李家恒（又名青青，党派出的伪饭塘乡乡长）、邱辉珍（又名海林古）、李××、李××四人。继由梅花乡长廖介操率队进大坪、湖洞，在上坪赖家捕我湘粤工委组织委员贺畔朵（又名贺发生，湘赣苏区永新县总工会主席，长征留湘南工作），以及杨炳英为书记的马头岭党支部八位同志，其中五人是杨炳英一家的。杨炳英、杨炳源、杨炳煌三兄弟，由于叛徒谭金英指控不释，被敌人关死在牢里，村庄也被烧毁。梅花特支（与泗公坑、马头岭党支部成一片时，应是湘粤边工委直接领导下的特区）的泥木工支部负责人谷长振、谷安龙与周宜卡被敌捉去后，转解原籍耒阳法院囚禁到将死时回家死去。

抗日战争爆发，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国共第二次合作形成。曾连任湘南特委书记四个年头的王涛从延安出发，一九三七年底来到了湘南，以新四军中校秘书的公开身份，来改编游击队开赴前线抗日。先到桂东，一九三八年元月才到耒阳、郴县、乐昌。他参加长征后，整整三年，游击区的干部和群众非常想念他，他那慈祥无瑕、唇红齿白、笑咪咪的形象，特别使人感到温暖。记得王涛当时有几句话是这样说的：“你们这些山老鼠、土包子，一不看报，二不想一想……”同志们也如昔日的习惯一样在他跟前好说话，便七嘴八舌地说：“报也看了，道理也懂得，如果不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那就会亡国灭种！可是谁也不敢讲呀，王明路线‘整人’咧！”经过王涛向各层干部的说服，使大家第一次领会到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路线的精神。随着，李林率湘粤边赤色游击大队全体指战员，在饭塘乡牛栏冲村集中，嗣后经过在良田、赤石两处整训和扩军，队伍发展到一百三十余人枪，三月下旬由郴县开赴耒阳县江头村，四月下旬改编为新

四军暂编第一大队（含刘后总部）。继由灶市乘火车赴皖南，编入新四军军部特务营，李林担任特务营副营长，欢送同志们上前线杀敌后，我就参加到王涛为书记的湘南特委工作，兼任桂阳县工委书记，迈上新的征途。

回忆过去，激励未来，十年战斗生活锻炼和实践，充分证明：相信群众，相信党，这两条基本原理必须坚持，才能建设好社会主义直至共产主义社会。

〔编辑时，对原稿个别段落略有删改。〕



革命烈士李家泉

廖治金

一九二九年十月六日中午，一位遍体鳞伤、五花大绑的青年，被一群如狼似虎全副武装的国民党乐昌县的警察，押赴县城西门口外刑场，几声枪响后，他倒在血泊之中。这位惨遭杀害的青年，就是中国工农革命军乐昌独立营营长李家泉。

一

李家泉，字镜川。一八九八年五月四日生于乐昌县坪石皈塘村的一个农民家庭里。其父李传良，母白氏，生有二子，李家泉排行第二。年幼时，其父就离开了人间，靠母亲含辛茹苦拉扯着他们长大。

童年的李家泉，天资聪颖，乖巧伶俐，深得母亲喜爱，决心培育他成材，送去读书，家境困难，就变卖田地。从七岁起，入私塾五年，后转到乐昌高等小学堂，一九一八年小学毕业，又以优异成绩考入韶州高等中学校。他年少志高，勤奋好学，善于思考钻研，学业成绩优良，很得老师厚爱。

一九二一年，李家泉中学毕业时，恰逢族人、国民党左派人士李传楷任乐昌县县长，聘李家泉入乐昌县政府任职，